

引言

启蒙，是 17~19 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教会神权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战斗口号。“启蒙”一词在英语中为 Enlightenment，意即“进入光明”。在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即将过去的时候，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德国的莱布尼兹、沃尔夫、莱辛，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对中世纪教会为代表的宗教蒙昧主义和国王为代表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从而形成了以理性和科学、民主和法制为主要特征的启蒙思想。这种启蒙思想预示着中世纪的黑暗将被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光明所取代，成为新时代来临前的曙光。

几乎与西欧启蒙思想产生的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的时候也产生了早期启蒙思想。17 世纪初期的明清之交，封建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已经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堤坝上打开了缺口，人民的反抗斗争正震撼着封建统治的大厦。这表明中国的封建社会虽尚未出现全面的崩溃，但其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已经出现了能够“进行自我批判”的特定条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以李贽、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

然而，中国早期启蒙思想远远没有西方启蒙思想那样幸运。清朝在全国的统治确立后，封建专制主义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清朝统治者采取了空前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宋明理学的权威在“御纂”、“钦定”的形式下得以恢复；中西文化交流也由于闭关政策而中断；随之而来的是启蒙思想的夭折。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理性法庭”没有导致“理性王国”的建立，甚至它本身也被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字狱“法庭”判处了死刑。

正当整个思想文化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时，西方殖民主义又破门而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中国思想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在“世变之亟”和“海警飙忽，军问沓至”的刺激下，开始把视野从科

举场和故纸堆转向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他们一方面继承了 17 世纪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又接受了伴随着殖民者入侵而涌入中国的西学思想，从而逐步形成了带有明显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启蒙思想。

一 鸦片战争后近代启蒙思潮的萌芽

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内，面临着“世变之亟”局面的思想界，呈现了复杂多变的情况。其间相继出现了道咸经世实学派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革思潮、洋务运动中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思想以及随之而来的追求科学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和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初步民主思想。这些思想尽管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就其阶级实质而言，也未必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但是它们怀疑旧的传统，否定封建专制，揭露中世纪的愚昧，提出了一些反映中国社会近代化要求的片断理论和对未来的设想，从而开启了一代新的学风，并给后世以新的启示，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萌芽。

1. 道咸经世实学派对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中将晚清新思想的萌芽归功于龚自珍、魏源。确实，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经世实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特别是他们对中世纪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上承明清之交的早期启蒙思想，下启近代新学之风，对以后的洋务派、维新派甚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龚自珍曾以“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自任。这也是林则徐、魏源等一代经世实学派的共同抱负和心愿。他们为了“开风气”，对封建专制统治、封建蒙昧主义以及腐败的“士林风气”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对封建社会衰败现实揭露和抨击最为激烈的是龚自珍。他在对封建统治危机进行全面揭露的基础上，尤其对封建末世那种“万马齐喑”的现象感到愤慨和不满。他认为当时朝廷内外从上至下人才枯竭到了极点，不仅朝廷无“才相”、“才史”、“才将”，学校无“才士”，甚至连农工商各行各业也无“才民”、“才工”、

“才商”。即使出现了“才士”与“才民”，也遭到“百不才”即现实生活中不学无术而又掌握大权的层层官僚的束缚、压制和摧残。龚自珍认为，“百不才”扼杀人才，正是靠弥漫于朝野上下的腐败风气。这股腐败风气使人们思想僵化，因循守旧，整个社会处在寂然无声、灯烛无光的漫漫长夜之中，听不到不同意见，只听到一片梦呓和鼾声，甚至连最不能忍受寒冷的鸱也不啼叫了。在他的笔下，勾画出一幅多么可怕的黑暗、愚昧的中世纪图景。龚自珍将这一切归咎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他认为，当朝的皇帝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从不把臣下当人看待，甚至于仇恨“天下之士”。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不惜“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天下之士的廉耻之心都给消灭了，驱除干净了。因而大臣们只知“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以谄媚阿谀来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这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龚自珍的上述揭露一针见血地触及了这一问题的实质。

魏源也对清王朝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也指出了清王朝面临“人才不竟”的危机，认为满朝文武大臣、官僚士大夫都是“嵬琐中材”、“窳陋之

臣”、“腐儒鄙夫”。他们虽然满口心性义理，但对国计民生毫不关心。他认为造成这种“人才不竟”的主要原因是适应封建专制制度的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制度，特别是八股科举制度。他抨击八股科举制度是“无益之画饼”，是“无用之雕虫”，对“兵农礼乐工虞士师”毫无用处。

针对清王朝这种“万马齐喑”的黑暗现实，龚自珍、魏源等经世派人士大声疾呼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要祛除“人心之寐患”和“人才之虚患”，也就是说要从思想上把人们从昏聩愚昧的状况中唤醒，要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如何才能打破“万马齐喑”的专制和愚昧局面呢？龚自珍认为“九州生气恃风雷”，魏源也呼吁“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他们所希望借重的“风雷”是什么呢？由于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希望一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的出现。他们希望的是清王朝能“更法”、“变古”。从思想文化方面而言，他们希望广大知识分子从思想箝制和蒙昧主义的阴影中冲出来。龚自珍曾力主私人议政权。他说：“夫有人心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证同异之事；有考证同异之事，

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则必有所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于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自己的考察判断来评论政治的权力和自由。他并没有主张“参政权”的平等。在他看来，“居上位者”和“居下位者”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考察分析所作的是非判断对政策制定和实行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但他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力的平等——即使是“居于下位者”无力按自己的是非判断来制定和实行政策，也应该将自己的是非判断公之于众，“昌昌大言之”。这无异于是一份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对当时的封建文化专制和蒙昧主义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否定。

同样，魏源也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他认为无论是天子还是庶民都是自然界“五行之秀气”凝聚而成，因而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天子是“众人所积而成”，因此，天子应“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他把整个社会比喻成一个人的身体，天子只是社会的头脑，而百姓则是维系社会存亡的呼吸器官。因此，他强调天子要让庶民参与朝政，

要允许百姓上书言事；而天子则应采取各种方式来倾听、接受百姓的意见。他把言论自由的程度作为判别社会政治是否清明稳定的标志。他认为如果在京城里人民也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即“言在都俞”），这是景运之世才有的大好事；而如果人民把话都憋在心里不敢讲出来（即“言在腹臆”），社会就会发生危险。也正是如此，他针对八股科举考试的空疏无用，提议“大开直言之科”，让士人和庶民有说话的机会和场合。

经世实学派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批判还表现在他们提出的“众人自造”和“有情”、“尊情”的观点上。龚自珍认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也就是说“众人”不是圣人创造的，而是自我造化的。因此，众人不要受什么“天道”、“太极”的主宰，而应该自己主宰自己。虽然他片面地夸大了“众人主宰”的作用，甚至把天地万物也看作是众人造化的结果，不免陷入唯心主义。但他强调众人的作用，主张众人摆脱“圣人”、“天道”和“太极”的控制，却孕育着强调个人自由，主张人性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因素。龚自珍还进一步提出了“有情”、“尊情”的主张。他认为

人皆有情有欲，这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有意乎锄之”也不可能去掉，只有对这种情欲予以宽容和尊重，让人们的真实感情和欲望自由地表达出来；同时，也只有“各因其性情之近”，才能培养出各具个性的各方面人才。这无疑具有要求个性解放的意义。

魏源也认为人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他指出，任何人都天然存在一种“本觉灵明”。这种“灵明”的本体来自于天，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因此，“人人可以为日，可以为月”。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能“造化相通”，“自造化”，也就是说要自己掌握自己，充分发表人的自我创造能力，就可以“造化自我”。他还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而人有各种自然欲望如食、色诸性，这是不能强制压抑的，只能顺其自然。这些观点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人文主义色彩。

龚自珍、魏源等经世派人物都反对汉学的脱离实际和宋学的空疏无用。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正因为如此，他们摆脱了汉宋相互责难的争论，从书斋走向现实，对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财政、水利工程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提出了许多

不失为真知灼见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中往往还包含着许多科学的成分，如包世臣在《筹河四略》中提出了御坝、浚淤并举的治河方法；魏源关于黄河将从黄海入海改为渤海入海的预测；李祖陶在《东南水患论》中关于盲目围湖造田，造成长江连年水患的分析都是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从这些真知灼见中，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经世派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因素。

然而，更能体现经世派思想中理性主义因素的是他们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而形成的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新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首先把眼光投向外部世界的经世派人物是林则徐。他于 1840 年前后在广州主持禁烟时就网罗人才，收集、翻译了大量外文书报，编成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魏源又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一书。此外，姚莹的《英吉利国志》、《英吉利纪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丛书，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也在此前后相继问世。这些经世派人士不约而同编撰域外史地著作，除了激于“欲制夷患，必筹夷情”的动机外，从文化上来说则反映了一种“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

事”的心态，显示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希望冲破思想文化的封闭状态，走向世界的历史趋向。这本身就具有文化上的启蒙意义。

上述著作的作者在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天朝上国”和“夷狄小国”、“严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而开始流露出一种新的“中国和世界”的意识。在这一点上，魏源的思想表现得最为突出。

魏源在鸦片战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写了《圣武记》一书，鸦片战争后，他又写了《海国图志》一书。在《圣武记》中，他对大多数士大夫“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反对将外国人都称之为夷狄，认为区别是否是夷狄，不能以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为标准，而应以是否有教化为标准。他认为很多西方国家的人都有高度的文化教养，这些人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这种观点当然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这表明了：魏源已经认识到在中华文明之外，还有许多平等的文明之邦。在《海国图志》中绘有地图 78 幅，其地图的排列顺序先是地球正背面的总图，然后是各洲总图，再是各国分图。这种层次分明的编排说明魏源已完全突破了封建士大夫那种认为“中国是天下中

心”的陈腐观念，而代之以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再从他对各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况的介绍来看，也是试图帮助人们打破旧的世界意识，树立新的世界意识。他在分析英国侵略中国的必然性时，认为英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侵略，只要是有土地有人口的地方，它都要侵占以得到经济上的利益。因此，英国侵华是它“急于寻新地”的世界殖民政策的必然结果。他还把英国将孟加拉、印度占为殖民地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这样，把中英战争放在世界形势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不仅突出了中国所面临的侵略的严重性，而且也抛弃了在中国和世界各国关系上的那种一方“羁縻”、“安抚”，一方“朝贡”、“依附”的陈腐观念，向国人展示了一幅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面前中国被动挨打的危险景象。更为可贵的是魏源还一反“中国为天下夷狄效法”的传统观念，理性地指出中国有很多方面不如英国，从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尽管他只是明确指出中国要学习英国在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这三个方面的长处，但从他对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各方面情况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还意识到中国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他方面的诸多差距。如他肯定了英国

“兵贾相资”的富国强兵之路，主张中国应该效法，整顿武备，发展对外贸易；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体表示仰慕和向往，认为“其章程可重奕世而无弊”；甚至他还比较了中英两国人民在文化心态上的差异。他认为英国在中国的邻国“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书地志，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是一种虚心学习其他民族长处的文化观，进而比较中国，他为“中国反无一人瞭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而感到担忧。

出于上述认识，魏源极力主张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打破旧的封闭的心理，“扩万古之心胸”，最终使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这反映了他希望中国走向世界，并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也集中体现了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理性主义态度。这种理性主义的态度无疑包含着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怀疑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精神，对开启一代新风，促进近代启蒙思潮的萌芽、产生是不无意义的。

2. 洋务运动中自然科学的传播

面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以及清王朝统治危机的深化，清统治集团内一部分开明官僚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的“师夷”思想，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开始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军事装备和自然科学知识，建立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厂和民用企业，训练了一支近代海军，并举办了一些近代教育事业，从而兴起了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这场近代化运动以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为目的，以经济和军事近代化为中心，又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场以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旧思想旧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它毕竟是一场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在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军事装备和自然科学的同时，它不可能不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冲击；在经济和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中，也势必导致人们包括洋务派代表人物自身在价值观方面某些趋向于理性主义的变化。这些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初具理性主义色彩价值观的产生，无疑对今后启蒙思潮的兴起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洋务派代表人物对泥古守旧、墨守成法的顽固保守思想进行

了批判。他们指出：中国的士大夫在封建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往往拘于成见，高谈气节，认为“仅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就可以抵挡外敌侵略，这是不可相信的。他们对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人才危机也多有揭露，甚至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一些批判。他们认为清朝士大夫面临“至变之局”仍然“日日习常蹈故，事事牵义拘文”，就好像是在救人于水火时仍“雅步从容”。左宗棠更明确指出：清政府“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而人才不佳的根本原因在于科举制度。他认为“八股愈做得人格，人才愈见庸下”。因此，他呼吁：“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他还比较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价值观方面的差异，认为“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虽然他没有完全抛弃“义理之本”，然而他对那种认为西方国家“执艺事者舍其精”，而中国“讲义理者必遗其粗”的成见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这种观点并非左宗棠一人的认识，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思想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对中国重义理轻科技、避实就虚的传统价值观的一种“重新估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

下，也具有“开风气”的作用。

洋务运动对近代启蒙思潮兴起所做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促进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洋务派代表人物在推动经济和军事近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比较深切地认识到自然科学对于近代化事业的重要性。奕？在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时曾指出光是学习西方人制造机器、武器的方法只是“习学皮毛”，而要“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就必须学习西方人的天文学、数学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大力举办新式学堂，以近代自然科学作为教学内容；他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以培养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他们还罗致了一批科技人员，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传播的第一次高潮。

洋务运动中积极介绍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近代科学家有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他们早年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认为八股科举“无裨实用”，因而不屑于科举入仕而“专研格物致知之学”，走上了自然科学研究的道路。在国门初开，西学东渐的形势下，他们没有像封建士大夫那样哀叹中国